

# 区域国别研究的关系路径:以东南亚研究为例<sup>\*</sup>

包广将

[内容摘要] 区域国别研究已然成了一门“显学”。然而,在区域国别研究的“迅猛”发展中也涌现不少问题。其中,追求区域国别本土化知识与普遍性知识之间的分野,促使区域国别研究呈现出两种难以兼容的研究路径:强调区域国别内部因素的内因路径和注重外部因素的外因路径。这两种路径之所以难以兼容,根本原因在于两种路径未能跳出实体主义的窠臼。对此,文章以东南亚研究为案例,从关系主义提出区域国别研究的一种关系路径。这种路径不仅“平视”区域国别内外因素,而且将区域国别的内外互动“关系”作为研究对象。

[关键词] 区域国别研究 东南亚 关系主义

[作者简介] 包广将,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 引 言

由于区域国别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与国家实力的兴衰存在密切关系,因而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会出现时而备受关注,时而落寞寂然的起伏波动。尽管区域国别研究在我国并非新生事物,但随着中国和平发展的提速和海外利益的增长,区域国别研究成为一门显学亦是水到渠成之事。<sup>②</sup> 然而,一方面,“区域”“地区”

<sup>\*</sup>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特色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探索”(项目编号:21JZD064)的阶段性成果。

<sup>②</sup> 有观点认为“地区研究的出现源于世界权力中心专注于更好地认识遥远的地域”。参见 Willem van Schendel, “Geographies of Knowing, Geographies of Ignoring: Jumping Scale in Southeast Asia”, in Paul H. Kratoska, Remco Raben, and Henk Schulte Nordholt, eds., *Locating Southeast Asia: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and Politics of Spac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90.

“国别”等概念往往给人们留下明确的边界意识,容易引起人们对特定区域的封闭性或排外性认知,即认为区域国别研究旨在对特定区域和国家展开独立研究。这种取向容易忽视的基本事实是,任何区域国别在时间上总是与其“过去”和“未来”相联系,在空间上总是与外界存在各种关系。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者认为,任何区域国别皆是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都受到客观规律的支配与左右。这种认知在区域国别研究中表现为一种科学精神,或者一种对科学主义的迷恋,认为只有不断向自然科学靠近的社会科学才是科学。此类学者倾向于以宏大学科理论分析世界各个区域的所有问题,强调外部因素对于区域的影响以及域外力量的干预作用。这种取向则容易陷入“科学悖论”,即为了追求科学的概念、科学的数据、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解释最终却脱离区域国别的基本事实。事实上,“讲道理摆事实”的演绎法与“摆事实讲道理”归纳法各有优缺点,二者仅是方法论上的差异。换言之,无论是强调区域内部因素,进而发展本土化知识,强调地方特殊性,还是注重区域外部因素,进而拓展学科理论,提倡本土知识的普遍化,都是在实体主义的世界里兜兜转转。那么,区域国别研究是否存在一种能将区域国别内部因素与区域国别外部因素统摄于一体的研究路径?本文试图从关系主义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 一、区域国别研究的两种路径与本文研究视角

在既有研究文献中,区域国别研究主要沿着两种难以兼容的路径展开。一种路径强调区域国别研究的本土化。张云指出,早期的区域知识更多是自发性和本土性的,限于对本土历史文化、社会习俗和生活经验等的自我认知。<sup>①</sup>不同的学术传统、制度结构和国家优先事项促成了不同国家内部独特的区域研究组织。在20世纪,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大多是跨学科领域研究协会的成员。<sup>②</sup>这些组织立足于本土环境的历史、语言以及文化等,从特定区域出发,在局限的范围

<sup>①</sup> 张云:《国际关系的区域研究:认识论视角的解构与重构》,《史学集刊》2019年第4期,第32页。

<sup>②</sup> 例如美国的拉丁美洲研究协会和亚洲研究协会、德国中东研究协会以及欧洲日本研究协会等。

内进行深挖。即使是来自于同一国家,某个区域研究圈也可能倾向于聚焦不同群体的语言、历史、文化和艺术的辩论。<sup>①</sup> 郭树勇认为,区域国别研究是针对特定国家或区域的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进行的全面深入研究。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联系密切,但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大于后者。它具有全面性、深入性、及时性和战略性等特征。<sup>②</sup> 显然,这一定义强调区域国别研究的本土化或区域化。更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国别研究还存在较为隐性的本土化趋势。这种以普遍性掩盖地方性的现象在国际政治领域较为普遍。国际政治理论中具有持续性的美国中心主义便导致区域国别研究拘泥于本土,忽视世界整体文化。<sup>③</sup> 这导致许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乍看是普遍性知识,细看则仍是欧美等地方性知识。对此,缪赛亚·阿拉加帕认为尽管美国的“区域”传统上是指除美国以外的地区,但美国的“理论”则意味着欧洲-北大西洋国家的独特经历。<sup>④</sup> 总之,强调区域国别内部因素的研究路径在具体实践中竭力主张通过掌握特定区域或国家的语言、宗教、文化等,提倡一种“沉浸式”的研究方式。“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乎?”是这种路径的基本信条,即先努力将自己变成特定区域国别的一条“鱼”,进而才能对这条“鱼”所在的环境展开研究。

另一种研究路径注重区域国别研究的外部性或普遍性。例如,在经济学领域,大卫·桑顿将特定区域与国别的经济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用统一的方法论分析不同的个案。<sup>⑤</sup> 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国别研究的价值充其量仅是将不同的地域或国家运用于特定的分析模式,为特定分析框架作案例使用而已,区域国别的特殊性、地方性知识始终处于从属地位。这种路径强调任何区域国别都是与外

① Andreas Ecker, “Bitte erklären Sie uns die Welt,” *Internationale Politik*, October, 2005, pp. 46 ~ 47.

② 郭树勇:《加强区域国别研究》,《人民日报》2016年2月15日,第14版。

③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 Introdu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Lessons From Asia,” Sponsored by the 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2005.

④ Muthia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Practice: Material and Ideational Perspectiv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Amitav Acharya, *The Quest for Ident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⑤ David L.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 4.

部“镶嵌”在一起的,从区域国别的内部视角无法真正了解区域国别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这种研究路径的信条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两种路径由于强调的重心或对象不同(要么是区域内部行为体,要么是区域外部行为体)往往难以兼容,甚至经常出现针锋相对的观点。例如对于国际关系理论与区域国别的关系,江忆恩强调外部因素,并认为忽略或掩盖东亚(以及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会导致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两个问题,即对基于特定地区的数据错误和误差关注不够,以及遗漏变量。<sup>①</sup>而唐世平等则强调区域内部历史背景的重要性,认为“许多国家的内部发展和外部环境乃至它的文化都受到了这个国家及其所处地区的历史的深远影响。因此,那些完全脱离历史知识而抽象出来的理论往往不会是一个好的理论。”<sup>②</sup>

诚然,不少学者也注意到了区域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并提倡各种因素之间走向融合。例如,江时学立足区域的空间交叉,指出“区域与国家有时重叠,但大多数情况下又是跨越民族国家的,区域之间还有交叉”。<sup>③</sup>任晓教授认为过分聚焦区域所导致的后果是造成围绕特定区域或国家展开的研究常常脱离于国际研究的主流,碎裂成以地域性为分界的窄小学术圈,很多时候自我设限,这极大地限制了学术互通、彼此借鉴和理论创新的可能。<sup>④</sup>然而,这些学者尽管注意到了区域内外关系的客观性,但仍未将“关系”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象,也未能明确提出一种区域国别研究的关系路径。

总之,传统的两种研究倾向要么强调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要么注重由外而内的研究取向。鉴于此,本文试图从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关系转向”探讨区域国别研究的一种关系主义路径。

---

① 江忆恩:《东亚对于国际关系理论深意何在?》,《云大地区研究》2020年第1期,第149页。

② 唐世平、张洁、曹筱阳:《中国的地区研究:成就、差距和期待》,《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第13页。

③ 江时学:《评中国学术界对“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学”的认知》,《拉丁美洲研究》2022年第2期,第4页。

④ 任晓、孙志强:《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趋势和方向》,《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1期,第147页。

## 二、关系主义:一种研究路径

研究对象的特性左右着研究路径的选择。区域国别研究具有跨区域、跨领域、跨学科的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关系主义取向的研究路径与研究对象有较强的契合度。

### (一) 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特性

区域国别研究具有多学科的跨领域性和受区域内外各种因素影响的跨国性,无论是学科的交融还是区域之间的互动都是建立在各种关系之上。一方面,区域内部各部分之间相互关联。地区内的国家与国家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正是这些联系塑造了特定国家之间共享的地方性。地区之内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安全等各个领域也是相互联系在一起,各领域在区域主义推动下走向经济一体化、文化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又进一步加深了各领域之间的联系。区域研究对象不是单一学科的研究领域,它往往建立在不同的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理工类学科基础之上。不同国家的区域研究领域可能在政治、制度和知识,以及与各个学科之间的关系方面具有鲜明特色。而且,“地区”“区域”等是可以修订和讨论的社会建构性概念,概念本身体现的就是各种关系的集合。因此,区域国别研究的主题对象、主要元素往往是因人而异和变动不居的。研究者身份的多重性也导致区域研究专家秉持着不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使区域国别研究呈现多学科之间交融的特性。研究者从各个学科路径入手展开的区域研究同样是相互联系在一起,区域国别研究愈发依赖跨学科、跨专业、跨语言的学术共同体。

另一方面,区域国别与外界存在各种联系。微区域、次区域、区域、超区域、全球等各个层次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地区内部与外交相互联系,地区在历史、现实及未来层面上也是相互联系的。跨国、跨区域的特性要求研究者既要区域国别研究置于各种关系圈层内,又要考察各种圈层之间的内在联系。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更加深了区域国别与外界的联系。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封闭、孤立地发展愈发与国家和区域的利益相悖。相反,由于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更好地

实现国家目标,各国正积极构建适合自身的关系网络并努力向外拓展关系空间。客观上,无论是交通航线、贸易网络,抑或是人员往来与信息互动,区域内外各种关系之间互联互通关系愈发紧密化乃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主观上,人们对开放合作的诉求和对更大活动空间的渴望也是主流民意。在现实中,各国各地区之所以积极构建、维持和经营各种关系网络,原因就在于关系或关系网络是各国获取外部资源或进行内外资源循环的载体。“国家权力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与世界政治中众多拥有权力和影响的对手合作而非对抗的能力。”<sup>①</sup>同时,各种关系或关系网络本身能独立发挥作用,并塑造区域与国别的特性。正如温特所言,互动会对行为体产生影响,互动过程会不断塑造和再塑造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故此,通过反复合作性互动,国家可以建构集体认同。<sup>②</sup>可见,过分强调区域内部视角,会遮蔽以各种关系为基础的国际交往对特定政治单元或经济体的塑造作用,割断区域发展与外部的关系脉络。过分强调区域外部因素,则会抹杀特定区域以历史、宗教、文化、地理、族群等不同形式呈现的地域特性。区域国别研究的这些特性客观上要求与之相匹配的研究路径。

## (二)关系主义的兴起与研究取向

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关系主义的兴起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关系转向”密不可分。关系转向始于1999年帕特里克·杰克逊和丹尼尔·耐克森发表的《关系先于国家:实质、过程与世界政治研究》一文。<sup>③</sup>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关系转向绝非孤案,而是整个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关系转向运动的一部分。复杂网络、社会网络、统计物理、量子物理、计算社会科学以及关系哲学、关系宇宙学、关系地理学等新研究议程都或多或少推动了研究路径的关系转向。关系主义的优点在于“它不因文化或方法论差异而对研究对象进行划界,却可以以关系本体为蔓,串联起最大范围和最多多样化的关系研究,因此更具有包容性。”<sup>④</sup>国内关系理论研究

① 吴志成、何睿:《国家有限权力与全球有效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第21页。

②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311页。

③ Patrick T. Jackson and Daniel H. Nexon, “Relations Before States: Substance, Process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5, No. 3, 1999, pp. 291 ~ 332.

④ 陈纳慧:《国际关系学的“关系转向”:本体论的演进与方法论意义》,《国际政治研究》2022年第1期,第41页。

的代表学者秦亚青将关系主义视角从传统的静态理论中抽离,聚焦于动态互动,提出以关系和过程为理论内核的“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关系理论放弃了主流理论静态地分析国际关系现象和规律的做法,转而强调背景知识可在实践进程中不断发展变化。关系理论认为,世界是由行为体间基于沟通、实践和互动所形成的关系和关系网络构成的,国家与关系结构是相互塑造、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sup>①</sup>

在上述理论背景下,提倡区域国别研究的关系路径具有现实意义。艾莉森·史丹宁指出,任何区域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那里”,相反,我们存在于一个本质上属于关系性的世界里,“那里”与“这里”往往交织并重叠在一起。<sup>②</sup> 当要了解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时,史丹宁则呼吁,应纳入关系地理学对地区研究进行批判性反思。<sup>③</sup> 关系主义指导下的地区研究应将地区或国家视为一个关系节点加以考察,不仅考察地区本身,而且将地区与其他地区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作为考察对象。这些层次上关系的状态和演变规律正是传统区域国别研究长期忽视的研究问题,也正是关系主义所强调的。那么,关系主义如何契合区域国别研究的特性?

首先,关系主义与实体主义兼容。关系主义并不是实体主义的对立面。准确地说,关系主义能够融合现存的实体主义。在关系主义看来,实体是关系的产物,实体本身不能离开关系而存在。<sup>④</sup> 关系主义具有开放性、联系性、互动性、整体性等特征,能跳出特定区域国别而以“上帝的视角”来看待特定区域国别,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视角盲区。更重要的是,“跳出”区域国别不是简单地抛弃实体或内部视角直接跳至外部视角,而是在理解区域内部行为体与外部行为体的基础上,根据特定区域国别与外部的各种关系展开全方位透视。由于关系就孕育在区域内外多重行为体的互动夹层中,关系路径可以帮助

① 秦亚青:《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几个假定》,《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0期,第20~22页。

② Alison Stenning, “Out There and in Here: Studying Eastern Europe in the West”, *Area*, Vol. 37, No. 4, 2005, pp. 378 ~ 383.

③ *Ibid.*, p. 378.

④ 陈纳慧:《国际关系学的“关系转向”:本体论的演进与方法论意义》,《国际政治研究》2022年第1期,第37~61页。

研究者将视线从纯粹的实体主义和静态理论中移开,聚焦于关系与互动。赵汀阳在考察实体主义与关系主义时指出,以个人作为分析单位难以求解普遍的必要价值,因为个人的价值即使能够被推广,也只能说明这种价值能被集体承认,但不能说明这种价值能对集体有益。以关系作为分析对象,其考虑的是任何人之间的可接受关系,以关系为基础的价值意味着普遍受惠和普遍兼容。<sup>①</sup>

其次,关系主义将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尽管在学界存在“实体先于关系”“关系先于实体”“实体与关系共在”三种不同的认知取向,但随着关系主义的发展,二者孰先孰后已不再是争论的重心,人们已将“实体”与“关系”置于平等地位。关系主义是从关系属性而不是行为体属性出发开展区域国别研究,除了考察区域国别内外实体因素,也考察区域内外实体之间的关系因素,因而关系主义拓宽了区域研究的分析对象。任何区域国别内部皆是由各种关系构成的整体,同时也通过各种关系与外部相连。在纵向上,关系主义注重时间维度,能对区域国别的历史、现在与未来进行动态透视。在横向上,关系主义强调不同区域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机制。关系主义研究路径试图通过纵向与横向上的各种关系来精准定位区域国别,旨在提供完整且立体的研究视角。区域国别研究提倡对特定国家和地区“深层经验知识”,鼓励理论、方法多元化和跨学科研究,这契合了关系主义不仅聚集于行为体本身,更跳脱于单元,关注研究对象“前世今生”与“社交群体”互动作用的研究视角。运用关系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加强区域研究与社会学学科之间的对话,将产生重要的知识回报。关注关系其实也是打破封闭,将案例放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关系链接中进行分析。运用关系主义对区域国别进行精细作业的分类研究,是“国际性”和“关系性”的学科内涵在单元层次的学术呈现,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某一区域的特定国家或国家组群的关系性经验、国际性知识与社会化实践。

再次,关系主义将“内因”与“外因”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关系主义打破了长期以来困扰社会科学研究的“行为体与结构、内因与外因”等二元格局,强调没

---

<sup>①</sup>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44页。



有一种事物的变化完全是内生性的。基因突变、细胞分裂、植物光合作用、化学反应、材料燃烧、动植物生长乃至日月星辰的运行等都是在外部环境的作用下才得以完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一种常见的内因论,但如果离开外部因素的作用,种瓜未必得瓜,种豆未必得豆。或者说,作为种子的瓜和豆本身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这说明任何一个实体都是与外界存在某种关系的,本身是一种关系的存在。因此,在关系主义看来,外生因素与内生因素已经融为一体,很难有明确的界限。

总之,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的变迁决定了我们的学术观点和我们所使用的研究路径的发展。在一个高频率互动的社会中,关系主义有利于我们理解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跨区域性关系,有助于塑造我们的动态性区域知识。要研究一个特定地区,应以关系主义的视角同时研究特定地区和地区与外部的关系,其中包含了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参与其中的主客体间互动与实践。任何从事“地区”研究的学者都应该密切关注其他区域与特定区域之间的关系。地理区分并不是地区研究的全部,更重要的是研究该地区的知识生成、思想观念等。通过收集和分析多元的观念和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关系主义路径有助于克服将地区研究局限于特定地理范畴的局限,也有助于揭示不同地区性知识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 三、关系主义与东南亚研究

东南亚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对象,在东南亚研究中亦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大多“经院派”学者以学科为导向,习惯从区域外部视角强调普遍性的外部因素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而多数“地方派”学者则倾向于从东南亚国家内部视角,强调东南亚的特殊性。不同于这两种研究视角,关系主义路径既不强调外部因素,也不抬高内部因素,而是平视两种因素并将两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这种路径与东南亚区域特性,尤其是在东南亚历史文化延长线上建立的东盟及其历史演进更加契合。

### (一) 区域外部视角下的东南亚研究

东南亚地区为何在文化、宗教、语言、政治体制等方面极具多样性? 最直接的原因是该地区深受域外大国和多种外来文明的影响。新加坡学者马凯硕将外来文明对东南亚的影响分为四个浪潮: 印度浪潮、中国浪潮、穆斯林浪潮和西方浪潮。<sup>①</sup> 在经济利益层面, 域外国家利益与东南亚国家利益已经密切交织在一起。对中国、日本、韩国等亚太国家而言, 确保能源资源的安全几乎是各国共同的核心关切。这一核心关切与东南亚国家利益紧密交织, 因为全球有约 1/4 的运油船航行于马六甲海峡, 而担负着中国 80% 的石油进口运输油船要经过该海峡。<sup>②</sup> 可以预见, 由于能源资源在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安全战略以及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 这将促使域外国家加大对东南亚的关注和介入力度。在战略层面, 东南亚国家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印太战略”、印度“东进战略”、韩国“南向政策”等域外国家各种重大战略的重要合作对象。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等外部因素也将进一步引发东南亚国家行为的变迁。例如, 对东盟来说, 通过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来平衡中国似乎是一个较好的既定方针, 因为这一战略在过去和现在收益良好。这种战略取向使中国、美国及东盟之间形成了独特的三边关系, 以至于只有在全面理解三方行为及三方互动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正确理解东南亚国家的行为。总之, 东南亚的文化繁荣、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皆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重要国际参与者的外交政策。

鉴于区域外部大国的深刻影响, 正确理解东南亚国家的理念和行为离开域外大国是难以想象的。然而, 如果仅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外部因素, 却容易忽视东南亚国家的改造能力及其特性。目前, 许多文献从外部大国视角研究东南亚并形成许多颇有影响力的观点。有学者指出, 虽然东盟各国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在不断加深, 但其却仍然正丧失对地区的领导权, 因为东盟的稳定是体系层面大国力量对比带来的结果, 东盟本身的影响力有限。他们认为尽管冷战结束以来

① [新加坡] 马凯硕、孙合记著, 翟崑、王丽娜等译:《东盟奇迹》,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3 页。

② 温小青:《中国石油进口海上运输通道风险与对策》,《世界海运》2022 年第 2 期, 第 24 页。

东亚经济相互依赖加深、地区多边制度发展迅速,但是均势政治依然是地区的主导战略文化。东盟自己不可能形成对崛起中国的均势,主要是依赖美国的地区霸权形成对中国的权力制衡。<sup>①</sup> 克里斯多夫·登特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东亚地区秩序和安全结构从地区层面来看是中日领导权博弈,而从国际体系层面来看,是中美竞争。<sup>②</sup> 还有学者提出了“二元格局”概念。周方银认为,东南亚国家普遍在中美之间实行两面下注,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在安全上依赖美国,从而形成了东南亚二元结构或双重领导格局。二元结构表面上似乎是东盟的主动作为和自愿选择,实质上是大国权力竞争与相互制衡所导致的。<sup>③</sup> 还有学者尖锐地指出,虽然东盟在地区的制度领导地位已经被地区大国所承认和接受,但是东盟的领导作用是基于具体问题的,它领导的制度合作能够化解一部分地区紧张,但是并不能解决地区重大安全关切。比如,在应对地区和国际金融危机时,中国的领导是关键,而在应对地区领土争端方面,一些东盟国家依然要求美国加强地区安全承诺。<sup>④</sup>

这些观点不乏真知灼见,但缺乏对东盟国家的关注,过分强调普遍性而掩盖特殊性,认为外部因素左右内部因素。相关研究即使看到了东盟国家的内部因素,却找不到合适的研究路径将这种内部因素置于分析框架的恰当位置,最后只能两害相较取其轻,直接将东南亚内部因素忽略不计。这种分析路径沿着大国展开,研究的重点还是大国对于体系结构、力量格局、国际秩序的塑造。从认识论看,此类研究的“国家中心主义”的导向明显。而以国家为单位的认知结构和以大国为主要分析对象的研究视角忽略了中小国家自身的特性。在“结构”“体系”“格局”“大国”等宏观力量的作用下,东南亚国家的力量和影响被认为微不足道,似乎也就失去了研究的必要性。在许多西方文献中,关于东南亚国家的政

---

① 张锡镇:《东盟实施大国平衡战略的新进展》,《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3期,第20~26页;曹云华:《在大国间周旋——评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11~21页。

② Christopher M. Dent, “Regional Leadership in East Asia: Japan and China as Contenders,” in Mark Beeson and Richard Stubbs,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Asian Reg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 236~274.

③ 周方银:《东亚二元格局与地区秩序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集刊》2014年第6期,第106~119页。

④ Richard Stubbs, “ASEAN’s Leadership in East Asian Region-Building: Strength in Weaknes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7, No. 4, 2014, pp. 523~541.

治知识往往是在威权主义与西式自由民主制的比较分析中推导出来的。使用这种前置性“区分”，即将“自我”与“他者”简化对立，事实上阻碍了我们探索东南亚政治和社会的真实面貌。在理解和分析东南亚政治时，人们往往情不自禁地使用西方标准来评判东南亚国家，严重依赖西方学术界的学术概念来建构对东南亚国家的看法。甚至这里面还存在一个难以摆脱的悖论，即当我们具有学术自觉自省并试图批判西方学术等级、学术话语或学术霸权的时候，我们需不断援引西方话语，而这又会在客观上进一步依赖并强化西方学术等级、学术话语或学术霸权。

## （二）区域内部视角下的东南亚研究

区域内部视角下的东南亚研究强调从东南亚自身出发，大多对东南亚国家的改造能力和特性持有积极态度和正面看法。事实上，面对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域外大国的介入，东南亚国家具有强大的改造能力，并不是被动的承受者。在探讨印度文明对东南亚的影响时，有历史学家认为：“印度殖民者将他们的整个文化和文明移植到了一个尚未摆脱原始野蛮状态的地区。”<sup>①</sup>然而不少历史学家从东南亚自身视角指出，在印度教和梵语语言在东南亚开始流行的约500年前，东南亚船只就已经在印度洋上进行贸易活动了。<sup>②</sup>使东南亚真正具有特殊性的正是它对不同文明的吸纳度，这种特殊性使东南亚成为历史研究的天然的人类实验室，<sup>③</sup>当然，这也使东南亚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镇。这说明，东南亚绝非印度文明施加影响的被动承接者，而是在积极探索外来文明如何为我所用。

建构主义者几乎都从区域内部视角来看待东南亚，认为东盟的力量源于其自身，且往往将规范力量运用到对大国或国际组织等行为体进行规范传播和体系塑造的活动中。贺嘉洁认为社会建构主义对东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东盟的规

---

① Pierre-Yves Manguin, A. Mani and Geoff Wade, eds., *Early Interactions Betwee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Reflections on Cross-cultural Exchang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1. p. xv.

② Kenneth R. Hall, “‘Borderless’ Southeast Asia Historiography: New Scholarship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Southeast Asia and Its South Asian and Chinese Neighbours in the Pre-1500 Era,”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Vol. 167, No. 4, 2011, pp. 527 ~ 542.

③ [新加坡] 马凯硕、孙合记著，翟崑、王丽娜等译：《东盟奇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范塑造能力,东盟越来越被视为一支规范力量。<sup>①</sup> 阿米塔·阿查亚指出,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东亚地区合作进程启动以来,“东盟方式”就一直因“效率低下”“制度化程度低”而受到批评,但是20多年来“东盟方式”不仅成为东南亚地区建构安全共同体的主导规范,而且成功扩散到东亚和亚太,成为地区合作的基本规范,有效维护了地区总体和平与合作。<sup>②</sup> 理查德·希格特、波林·克尔、安德鲁·麦克以及约翰·拉文希尔等人认为,决策者近年来对合作安全给予了更高的重视,这在东盟地区论坛和各种第二轨道活动、东盟—伊斯兰国家圆桌会议等案例中得到体现。可以看出,多边机构具有在亚太地区转变国际关系规范的潜力,必须将它们视为均势政治的可行替代方案。<sup>③</sup> 贺凯认为,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制度体系是东盟的“制度制衡”或“软性制衡”战略,即通过建立、利用和主导多边制度,来应对外部压力和威胁,以维护无政府体系中自身的安全。<sup>④</sup>

地区研究一直被批评为未能克服“外部世界”的本质形象,不加批判地复制思维模式,使区域研究同质化,建立起不对称的知识等级制,并使根据发展阶段评估地方的话语自然化。过去,地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欧美的研究机构推动并建构起来的,而非西方则被视为“狭隘智慧”的地方,仅仅是中心理论建设所需的“原材料”来源。<sup>⑤</sup> 显然,由内而外的区域内部研究路径有助于打破学科上形成的这种认识论规定,避免将研究置于既定概念、术语、观念及分类中。然而,这种研究路径也存在诸多弊端。遵循这种研究路径的学者容易陷入对特殊性的迷恋中,不少研究者为了突出东南亚的特性或强调与其他区域的不同,或者仅是为

---

① Jiajie He, “Normative Power in the EU and ASEAN: Why They Diver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8, No. 1, 2016, pp. 92 ~ 105.

② Amitav Acharya, “Ideas,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From the ‘ASEAN Way’ to the ‘Asia-Pacific-Wa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0, No. 3, 2007, pp. 319 ~ 346.

③ Richard Higgott, “Ideas, Identity and Policy Coordin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The Pacific Review*, Vol. 8, No. 4, 1994, pp. 67 ~ 79; Pauline Kerr, “The Security Dialogue in the Asia-Pacific,” *The Pacific Review*, Vol. 7, No. 4, 2007, pp. 397 ~ 409; Andrew Mack and John Ravenhill, eds., *Pacific Cooperation: Buildi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5.

④ He Kai,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3, 2008, pp. 489 ~ 518.

⑤ Jean Comaroff and John L. Comaroff, *Theory from the South: Or, How Euro-America is Evolving Toward Africa*,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 1

了突出学术观点的独到之处而刻意突出东南亚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通常潜藏着优越感,尤其是在去“西方中心”或提倡地方性文化的背景下,对东南亚独特性的渲染仅仅是为了与西方拉开距离,殊不知会走向东南亚优越论的另一个极端。例如,近来的“东南亚本位”“东盟中心地位”“东盟奇迹”“东盟长和平”等概念的兴起与这种优越性不无关系。

概而言之,如果我们仅从东南亚研究东南亚,缺乏对外部影响因素的关注,那么东南亚的历史、现实与外部是缺乏联系的;如果我们仅从外部国家的视角来研究东南亚,那么我们对东南亚如何吸收外来文化和影响的研究将被淹没于大国中心主义中。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尽管大多数学者同时看到了区域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但是由于缺乏合适的研究路径,使这些学者难以提出令人信服或印象深刻的观点。这背后原因在于,无论是偏向区域内部或外部因素的一端,还是采用中庸主义同时看待区域内外两种因素,实质上都是在实体主义的世界里转圈,未能跳出实体主义的窠臼。实体则是相互独立的个体,个体与个体之间显然存在明确的分界线,因而无论将视角聚焦于哪个实体,都会陷入顾此失彼、左支右绌的窘境。换言之,域外大国和文明对东南亚的影响与东南亚自身的特殊性之间并不是孰高孰低、孰先孰后或者内因与外因的关系,东南亚与大国之间的互动关系本身是理解东南亚的关键。

### (三)关系主义视角下的东南亚研究

关系主义视角提倡平等看待区域内部因素与区域外部因素,强调区域内部与区域外部之间的关系,这在东盟的成立和演进过程中均有明显体现。东盟的奠基性文件《曼谷宣言》明确指出,东盟国家“意识到在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和平、自由、社会公正和经济上的福祉只有通过促进被历史和文化纽带联结在一起的本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睦邻关系和富有意义的合作才能最终实现”。<sup>①</sup>这一表述充分体现了东盟国家对相互关系的注重,即只有保障了东南亚整个区域的发展与安全,才能保障东南亚各个国家的发展与安全。1976年东盟

---

<sup>①</sup> 王国平:《东盟:政治合作的经验与启示》,载梁志明、张锡镇等著:《东盟发展进程研究——东盟四十年回顾与展望》,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第一次首脑会议上又通过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进一步将这种关系思想拓展至区域外部。梁志明认为这是东盟一项极为重要的条约,因为它以条约的形式肯定东盟国家在纷争迭起的旧关系基础上建立起睦邻友好和协商共事的新关系,并强调“任何时候都要通过友好磋商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sup>①</sup>在东盟的安全观中,东盟成立伊始便将外部因素作为维护自身安全的基本因素,即单个国家的安全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

在20世纪90年代两极格局坍塌的背景下,域外大国与东南亚国家安全问题成为各国考虑的重心。各方的基本共识是东南亚安全离不开域外大国的合作。以东盟地区论坛的建立为标志,东盟以对话伙伴国的形式加大与域外大国的合作步伐。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东南亚国家进一步强化了自身与外部国家之间存在的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印度尼西亚经济学家哈迪·苏萨斯特罗在1999年对东盟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后的表现进行了一种关系性的描述:“由于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建构一个单一东南亚的事业接近完成,东盟依靠亚太经合组织副驾驶员以及东盟地区论坛驾驶员的地位在建立更广泛地区合作机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使东盟一直处于兴奋状态。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这一地位几乎在一夜之间崩溃。”<sup>②</sup>在这样的局势下,东盟意识到若要稳固自身,还得与域外其他国家携手并进。此后,由东盟主导建立的一系列区域合作机制出现迅猛增长,21世纪头十年成为东盟大力引入外部大国的高峰期。

然而,虽然东南亚国家认为外部国家与东南亚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及安全等领域是无法割裂开来的,但是东南亚国家并非任由大国的直接闯入,而是有步骤、有管理、有规范地慢慢引入各大国力量。在东南亚区域内部,东盟采用轮值主席国制度以避免一家独大的局面,并采用协商一致而非投票制度来避免各国自主性受损。对于区域外部国家,东盟通过《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盟宪章》等机制强调了“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为代表的

---

<sup>①</sup> 梁志明:《东盟的发展历程和历史经验》,载梁志明、张锡镇等著:《东盟发展进程研究——东盟四十年回顾与展望》,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sup>②</sup> [菲律宾]鲁道夫·C·塞韦里诺著,王玉主等译:《东南亚共同体建设探源:来自东盟前任秘书长的洞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87~88页。

“东盟规范”。这些规范和机制本身是东南亚国家与外部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南。通过这些过滤机制,东盟既迎合了域外大国的诉求,接纳了外部力量的介入,又根据自身的需求和特点令大国内化了东盟规范。

在“东盟方式”“东盟规范”或“东盟理念”的引导下,原本分离的各种联系得以建立并逐步“网络化”。马来西亚前外交部长沙飞指出:“东盟已经超越一个单纯的地区性政府间组织,而是一种被成员们共享的思维习惯。这是一种特殊的友好关系,它超越了国界、政府和民族。这就是东盟与其它地区组织——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最大的不同。”<sup>①</sup>“东盟方式”在凝聚关系网络的同时,其发展、扩散以及被认同又是以东盟这一关系网络为载体的,是东盟国家共享关系主义的主要内容。约翰·乔西里认为东南亚转向了更为复杂的势力平衡,包括军事、经济、体制和观念层面。这种影响力平衡策略的关键特征是包容性。东南亚各国政府已邀请各大国参加该地区的经济和外交事务,并且对任何外来力量在该地区行使不必要统治权的能力都构成了重大制约。<sup>②</sup>这种观点体现了东南亚与外部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东南亚国家一方面不排斥域外大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对域外国家的管理。许多建构主义学者对此也有类似的想法,他们认为在倡导和扩散本土规范的同时,东盟还成功实现了国际规范的本土化,比如将来自西方经验的“共同安全”规范本土化为“合作安全”。“东盟中心”不仅是一种制度形式,而且已经成为地区规范,意味着东盟规范对大国的社会化。<sup>③</sup>例如,通过对区域内外互动关系的治理,东盟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起到了重要的调和作用。某种意义上,东盟已经成为了加工国际政治思想的“世界工厂”,东盟峰会、香格里拉对话会等都是它的主要生产车间。近年来东盟较为成功的思想加工成果是2019年第34届东盟峰会发表的《东盟印太展望》。中国“一带

---

① Ghazali Shafie, “Détente and ASEAN: A Malaysia View,” speech on January 12, 1983, cited from Michael Antolik, *ASEAN and the Diplomacy of Accommodatio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0, p. 4.

② John David Ciorciari, “The Balance of Great-Power Influence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9, No. 1, 2009, pp. 157 ~ 196.

③ 参见 Amitav Acharya, “How Ideas Spread: Whose Idea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8, No. 2, 2004, pp. 239 ~ 275; 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第7~15页。



一路”中的合作、开放、共赢的理念,以及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大国平衡或者权力制衡思想都被东盟进行了再加工,最后产出了《东盟印太展望》,里面既包含权力制衡元素,也有对开放合作诉求,既吸纳了域外大国的理念,也提出了彰显东盟方式的互动规范。

#### 四、结 语

从东盟建立到其扩大化的进程中,始终存在两种基本力量:东南亚区域内部力量和外部力量,但这两股力量是相互制衡、相互建构、相互作用的关系。东盟通过制度、规范对大国进行社会化的过程吸收了外部力量的因素,而外部力量在与东盟国家接触与互动的过程中则吸纳了东盟国家的一些原则和规范。东盟发展至今构建的诸如“东盟方式”等一系列精神价值在逐渐被域外国家接受。<sup>①</sup> 东盟的成立与演进历程说明,如果我们将研究视角始终聚焦于实体主义,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区域内部与外部二者之间进行非黑即白地“选边站队”,或者以中庸主义机械地将二者杂糅进同一个分析框架。然而,关系主义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特定区域国别人民的观念与行为。正如任晓教授所言,历史地看,区域国别研究与世界各地的联系从松散走向紧密是密不可分的。<sup>②</sup> 这种联系是区域国别研究关系路径的基础,也是它的动力源泉。

---

<sup>①</sup> 关系主义在非洲国家联盟中也有类似的运用,非盟提倡“天下共享,连接众人”,出自“乌班图”精神。乌班图精神有两层意思:“人道待人”(对别人仁慈)和“天下共享,连接众人”(共同体)。这两层意思互相关联、互为表里。参见李安山:《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历史、目的与方法》,《云大地区研究》2020年第2期,第186页。

<sup>②</sup> 任晓,孙志强:《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趋势和方向》,《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1期,第135页。